

## 逆着柏拉图艰难地飞升

敬文东

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小说家吗? 还需要那种可以被称之为小说的写作方式吗? 种种迹象表明, 这正是文学在今天可能遇到的真正问题和深刻质疑当中, 最让人感兴趣的一种。在这种情况下, 小说家成为一种暧昧的角色, 小说写作变为一种暧昧的工作, 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事情了。在各色人等当中, 小说家恐怕是最难以拍着胸口, 来夸口自己身分的人了。想当年, 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他心造的理想国, 因为诗人是以不真实的、具有蛊惑性质的谎言, 模仿了柏拉图为世界始源找到的理念; 而今天的“柏拉图”们则有另一翻模样: 这类改头换面、不断重新出现的哲学家教导世人说, 你们要遵循一种功利主义的世俗生活, 你们的幻想也只能产生于对物质和世俗的追求之中——在今天, 幻想的本质定义就是对获得更高级的物质生活的快乐想象。该类“柏拉图”指着电脑、时尚、金钱等等说, 你们的小说的想象, 和这一切都将是相容的。

由于上述一切的巨大力量, 我们时代于是拥有了大量符合新“柏拉图”理想的那种小说家: 他们的小说写作, 也顺应了新“柏拉图”巨大手掌所指引出的方向, 尽管他们有时看起来是转弯抹角, 但从来不会从根本上违背柏氏大拇指指示的方向: 他们不再认为小说具有幻想和想象的权利; 或者, 他们的想象和幻想, 因为囿于新“柏拉图”手指所指之物的巨大引力, 其飞升的高度始终距离那些事物只有一毫米。我们的批评家也适时地、正确地把这定义为“书写当下”, 把它惊呼为“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”。这种小说和小说家, 当然成功地避免了角色与工作性质上的暧昧性, 却和词源学意义上的“小说”(Novel)有了巨大的背离: 后者一直在强调, 小说应该具备幻想性质的传奇性。

大江健太郎的《小说的方法》一书, 尽管是在大谈小说的方法和方法论, 但它很隐蔽的线索之一, 实际上就是对新一轮“柏拉图”们的坚决拒斥。对于许多“学院派”批评家而言, 大江对小说技术的分析, 很可能是他们最为看重的部分; 但我相信,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, 大江对小说技术之所以能生成如此的精心辨识, 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实际上, 在《小说的方法》中, 大江时而便以他欣赏的作家(比如君特·格拉斯、罗伯特·穆齐尔)为例, 更多的时候, 则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, 把已经成形的小说建筑一一拆开, 指出了小说家们为了大厦的建成, 在怎样使用, 使用哪些砖石、何种型号的水泥, 精确到了何种程度的标尺以及花费了何等程度的辛苦努力。在分析过程中, 大江的确像一个学究那样, 动用了20世纪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的众多批评术语(如陌生化、结构、颠覆、对话、复调)。但如果我们考虑到隐蔽在大江小说方法分析之下的、有关小说“技术发生学”上的分析, 我们就会觉得, 任何批评术语都决不是冷冰冰的学术概念, 它们在大江的论述中, 已经转化为有血有肉的、与小说和小说家的目的密切相关的有机成分。这就是说, 大江实际上想要阐明的, 是小说(家)在当今时代生活内容中的意义。这种意义对于词源学上的“小说”, 保持了高度的敬意——大江分明是站在了与新“柏拉图”相对立的位置上。

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, 大江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明确阐明了, 所有的小说技术都是为了一种完美小说的生成而发挥着作用, 而完美小说的定义之一,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揭示时代生活的本质内涵。要完成这一切, 小说始终应该具备巨大的想象能力、飞升能力和幻想能力, 要努力超越新“柏拉图”的巨大手掌, 要努力把飞升的希望以及与我们的时代生活有上下文关系的想象力, 输入到小说之中。如果不与此发生关系, 任何小说技术最终都是不及物的, 到头来只剩下纯粹的、可怜的技术。

《小说的方法》收有大江的自传《我的小说家历程》, 内中详细记叙了一个小说家的外部成长过程和内心的复杂经历。它以令人感动的态度, 表明了大江的小说理念: 任何不具备描叙时代“噬心主题”的小说写作, 任何不对“噬心主题”进行解释、批判和试图给出解决方法的小说写作, 都是徒劳的、暧昧的、不道德的。如果是与此相反, 那么, 小说家就有可能幸运地把自己暧昧的、边缘化的身分, 置于时代生活的中心, 也可能把小说写作本身, 置入各种对时代认证方式组成的大合唱之中。

大江的小说理论在众多批评术语的掩盖之下, 谈论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: 希望和命运。正因为希望和命运是人性深处的亘古主题, 它不会随着任何技术(小说技术、科学技术)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初衷, 正如同圣·奥古斯丁在说“我主上帝”那样, 它只“改变工程, 但不更动计划”。所以, 以此为天然使命的小说, 永远是一项前途光明的事业。也正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, 引起了人类生活的巨大转变, 命运和希望也有了自身的具体性。不同的时代, 有着不同面貌的命运和希望。而小说技术的发展与变化, 不过是为了适应希望与命运的不同面孔, 以便更加细致地描叙它们罢了。

大江令人信服的论述说明了、任何一种文学技术, 都决不是单纯的技术, 它的出现、壮大, 在骨髓深处都决不仅仅是

什么技术的“自为运动”，恰恰和它要书写的对象的需要紧密相连。而需要，正是任何一种技术生成的最大助力——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。

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，都有它自身所需要的“柏拉图”，这个“柏拉图”有许多不同的变脸，可能是焚书坑儒，可能是文字狱，可能是某种社会禁忌，可能是高度世俗与平面化的物质生活，也可能就是希特勒和一定的社会趣味……但只要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，你一开始的任务，就是要努力挣脱各种“柏拉图”的羁绊，把可能暧昧的角色明晰化，把可能暧昧的工作坚定化。只有战胜了“柏拉图”，真正具有飞升性质的、合乎词源学意义上的小说品格才会出现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小说和小说家永远都是任何时代所需要的，不管那个叫做小说的东西在今后的岁月里，会产生何种形式或何种程度的变化。